

上海持枪杀人案 中国式底层互掐

权静/文

上海持枪杀 6 人案,呈现“中国式底层互掐”的典型逻辑:特权阶层占据大量权利财富,底层生存空间被挤压得异常狭窄,为了抢夺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底层关系日益冷漠、紧张、甚至你死我活。

上海出现持枪杀人的恶性案件。据记者报道起因是利益纠纷,杀人者范某是一民营化工厂的承包者,厂子倒闭欠债,被杀的是厂子的一级承包商李某和另外 3 个厂子的职工,外加一个倒霉的黑车司机和一个被抢了枪的哨兵。

各种事件,都呈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种“中国式底层互掐”的典型逻辑表现为:特权阶层占据大量权利和财富,中低层生存空

间被挤压,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中层向上通道堵死且不断向底层陷落,底层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甚至互掐,为了争夺有限的空间和资源。

比如,买房。特权阶层早已拥有多套房产,得来之易、成本之低、数量之多令人咂舌。底层人互相掐,已经买了房的不想房价降,买不起房的嚷嚷,恨不得房产税增值税各种手段“向我开炮”,只要房价能降。

比如,高考。特权阶层的孩子中学就出国了,底层互掐,京沪籍家长反对放开异地高考,在京沪工作却没有北京户口的家长反问,我也是纳税人,凭什么我的孩子不能在这儿高考。

比如,医疗。特权阶层有高端病房,公务员看病基本全报销,底层因病致贫并不鲜

见,医患关系日益紧张,患者只觉医生无德,可能想不到,本该收入体面的医生护士,也被压榨,没有保证尊严的薪资,只能以药养医或收取红包。

比如,养老。体制内退休,工资和退休前一样。而像陈水总,因一个失误没法领取退休金,火烧公交车。虽然他上访无门,人生受挫都不足以让人原谅他报复社会的暴行。但他烧死的恰恰是跟他一样处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不也是一种变相且变态的“底层互掐”吗?

在中国的大地上,时时上演这种底层互掐的故事。这起持枪杀人的案件,究竟承包者范某为什么要残忍杀死一级承包商李某和其他人的细节,不得而知,但厂子倒闭负债累累确是案件发生的直接原因。

更大的背景是各种垄断国企攫取了行

业中的巨额利润,变成最赚钱的公司,而经济形势恶化,下游中小企业纷纷倒闭。这起“经济纠纷”导致的恶性杀人事件,不也是“底层互掐”的一个经典样本吗?

最后想起一部让我很震撼的电影(In Time),中文翻作《时间规划局》。这个故事里,每个人到 25 岁就不再变老,货币不再是金钱,而是时间,卖任何东西都是花时间,比如,一杯咖啡 1 小时,一顿饭 3 小时。每个人花完了手上的时间就死了。

故事的主角来自穷人区,这个区里的人,常常手上只有一天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今天工作,挣明天活着的时间,过了今天没明天朝不保夕。而在富人区,住一晚酒店的花费就是三个月,一些富豪手上的时间够他们活几百、上千,甚至上万年。

当然,故事的结局很理想主义:吊丝男

主角被富豪女儿爱上变身高富帅,两人一起打破了区域之间的隔离,摧毁了不公平的制度,拯救了穷人,最后皆大欢喜。但里面的一句台词一直刺痛我骨髓。

男主角问,人不老也不会死,人口不会爆棚吗?富豪透露了时间规划局的秘密:那些穷人被困在穷人区,我们只要不断提高物价水平,他们为了活着自然会拼命工作,弱的病的残的撑不够活着的时间自然淘汰死掉。控制生活成本就控制了这区域的人口。而他们源源不断的产出,可以保证我们这些富豪永远活下去。

看到电影的这一段,我脊背发凉,倒吸一口凉气。穷人区里那些黑暗的生活,犯罪抢劫欺诈,人和人之间的麻木冷漠,为了活下去的挣扎甚至殴斗,是多么令人伤感而无奈。

流动性泛滥下的“钱荒”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朱宁/文

近期中国国内出现的“钱荒”事件,不但对银行和金融机构构成了一次重大的冲击,给 A 股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动荡,也吸引了全球众多投资者和监管者的关注。从一定意义上讲,过去一周发生的市场波动,是一次由央行主导的,并且大体在央行监控之下的可控性“金融危机”。正像可控性核聚变和可控性核爆炸一样,可控性的“金融危机”一方面可以将金融危机的威力和危害充分暴露在各方面的市场参与者面前,另一方面可以保证“金融危机”不会真正威胁经济的运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定。

无论这次可控的“金融危机”是否达到了央行所预期的目的,也无论市场对于央行的沟通方式和手段抱有怎样的担忧和不满,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传统的压力测试显然没有能够充分反映目前中国银行业和中国金融体系所面临的或有性风险(contingency risks),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和稳定性远没有金融机构自身和监管层所想象得那么稳健,而中国的金融体系,可能会比原来各方面所估计得要脆弱得多。

但这—发现好像又带来了若干悖论,而众多悖论中最难以让人理解的是宏观层面流动性的泛滥和微观层面的流动性枯竭。

一方面,从 2002 年到 2010 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由 2 万亿元扩大到 14.27 万亿元,年均增长 27.8%,比同期人民币各项贷款年均增速高 9.4 个百分点。2010 年社会融资规模与 GDP 之比为 35.9%,比 2002 年提高 192 个百分点。广义货币 M2 在短短的过去几年间,就从 50 多万亿翻番到如今的超过百万亿。流动性不可谓不充分。

但另一方面,困扰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已经持续困扰了中国经济有一段时间了。随着事态的发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某些地方国有企业也传出了不同程度的资金紧张的问题。但这一次连一向家底殷实,赚钱多到“不好意思”的银行都爆发出资金紧张,实在不能不让入对中国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着实担一把心。

这次可控性的“金融危机”可能恰恰暴露出中国金融体系的若干个紧密相连的风险。而这些风险恰恰解释了为什么金融体系为什么会在如此泛滥的流动性环境下出现惊人的“钱荒”。

首先,流动性资产沉淀了大量的资金和流动性。过去一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越来越小,印证了各方关于新增融资大多被用于金融领域,尤其是投资到房地产和预期收益高的信托产品和理财计划领域的担忧。社会融资越来越多地被

用于追逐短期的投资收益,而非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其次,投机性资产流动性往往很差。无论是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是很多在产能过剩领域的重复投资项目,现金流都很薄弱,资金流动性差。非如此,这些投资项目也不会被逼到以远高于银行利率的水平进行融资。等到系统性流动性收紧的时候,这些项目唯一可以用来缓解流动性匮乏的手段,就是向投资人许诺更高的收益率和更长的还款周期,以解决其眼下资金无以为继的难题。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就是金融史上屡试不爽的借新还旧,把饼越画越大的“庞氏骗局”。

再者,投机性资产之间有紧密的相关性。无论是房地产开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还是众多的信托计划和理财产品,其现金流和流动性往往都紧密地和刚才所说的流动性很差的投资密集型的项目绑定在一起。这种高度的相关性不但给借钱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流动性枯竭时筹措资金带来了很大的难度,也让银行完全暴露在对手方流动性匮乏的风险之下。一度之间,众多银行突然惊醒,自己的风险模型和拨备都忽略了各种资产可能同时出现违约的可能,而自己在一时之间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应付哪怕是一丝对自己的安全性产生的质疑和挤兑。这正是为什么众多银行在过去一周上演“钱荒”,也是为什么众多金融机构在 2008 年面临灭顶之灾。

最后,投机性资产的价值对流动性和流动性增量极为敏感。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飞速信贷扩张和流动性注入之后,所有的投机性资产的规模都已经今非昔比。不要说是流动性的收紧,即使是流动性的增量不足,也足以让“吸金如土”的投机性资产价格出现崩塌。更可怕的是,作为这些投机性资产的出资方,商业银行对自己的流动性并没有多大话语权 and 决策能力。系统流动性的闸门,控制在中央银行手中,连商业银行自己,也不知道机会的窗口那一天会被收紧,潘多拉的宝盒,很可能也会在同时被打开。

这—次的钱荒,无论市场最后如何反映,央行最终如何应对,至少起到了三点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提醒所有市场参与者,在流动性泛滥的情况下,也有可能爆发“黑天鹅事件”般的金融危机;其次,市场不会只涨不跌,政府不会,也不可能提供隐形信用担保,为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买单;最后,大风起于青萍之末,风险,可能会在入最没有准备的时候浮现,无论你准备好了没有。

如果,上一周的市场惊悚真的能达到以上三个目的,这—次的“钱荒”也就算没有白闹。

读书真的无用吗

顾爱/文

一年一度的高考分数线终于出炉了,十几年寒窗苦读,有的将出人头地、有的则默默无闻终老此生。高考是人生的一个叉路口,也是人生的一个跳板,特别是来自穷乡僻壤的农村孩子,高考似乎是迈出乡村的唯一渠道。

事实是许多孩子修完大学学业后,现实似乎没有理想中那么美好,今年近 700 万等着就业的大学生就业率却不高,自己理想的工作的找不到,会聘用的又不想做,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冲突。

而笔者以前的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同学成功和失败的均不少,发现往往以前读书吊儿啁当的做了老板,比以前成绩优秀做老板的要多,难道这就是社会上流传的“读书无用论”吗?

笔者发现这些年“成功”的同学文化程度均不高,他们分别在矿产资源、房地产和相关产业链、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中发了财,或许是类似国家“四万亿投资”造就了他们!因为他们善于人际交往关系的交流、应酬,这一点我是自愧不如。

而读书好的呢,大多分布在企业办公室、公务员和教师等领域,其中或许有类似张曙光、刘铁男似的人物,但给人的印象是不太有出息,更多的同学分布在普通的企业员工行列。笔者曾经在深圳打工过十六年,因为文化程度不够,社会关系不多而没能在深圳继续呆下去。深圳入户是本科毕业生可到劳动局直接转深圳户,大专以下需积分入户,海归博士后还能获政府福利房呢!这说明读书还是有用的。

受教育程度高低并不代表您能力的高低,事实证明在中国这块土壤这会很跟户籍挂上钩,跟社会福利直接相关,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一张身份证获得的社会地完全不对等的原因。记得网上曾经报道过,说有一对张姓父子没有北京户口,老婆离婚去美国了,儿子在北京读高中,因为没有北京户口不可以参加北京市高考。求爷爷告奶奶都不成,结果在美国的母亲把儿子户口转到美国去后,不但可以在北京高考,还可以加 10 分,想不到吧?

当今社会,文凭越高就像打游戏中的等级越高,不管您能力如何,反正拥有的特权就越多。像在美国,比尔盖茨大学没毕业也能实现美国梦,在中国,您大学没毕业想要实现“中国梦”的几率是很低的,除非是有一个有权或有钱的“爹”或“干爹”。如果没有,更多的途径是通过自我努力获得高校的这张“入场券”来搭建人生的舞台,最起码读书多的人,在语言谈吐、与人沟通方面表现出的文雅、大度而不是庸俗的。

现代社会是追求创新的社会,自我努力很重要,实现个人理想的时候顺便可以带动更多的人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IT 界精英马云先生我非常敬佩,虽然他的成功是时代造就的,他的电子商务解决了千千万万人的就业,盘活了物流和快递业,也解决了宅男、宅女、吊丝的吃饭问题。马云的成功不是偶然,他的功底在于他读的书比别人多,他对时代需要什么看得比别人透!我都忍不住要尝试一下在马云淘宝网开店的冲动了。

在此,笔者提醒一下在校或不在校的同学,知识是很重要的!《爱情公寓》中的主人公曾小贤说过一句话:我的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错了,就是人生的一个败笔,要尽量避免犯错!



(本报所刊载文章系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斥美国 贼喊捉贼栽赃陷害

删敏元/文

美国遭遇斯诺登揭秘被揭,从其霸占的民主、自由、人权道德高塔顶尖上跌落下来,道德的“皇帝的新衣”被撕破,伪善的面子、虚假的里子被暴露,而且这还是美国政府侵害美国人和世人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冰山一角,随着斯诺登继续爆料及其他揭秘的跟进,美国政府作为全球最庞大、最先进的情报间谍基地组织、世界上最强大的网军基地大本营的狰狞面目将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国际社会要求美国作出交代

现在仅斯诺登小试牛刀的揭秘,就激起美国人和世人对美国政府的愤怒和群起攻之。国际社会和舆论都要求美国对其网络、电信侵犯民众和独立国家主权的间谍活动和黑客行径做出解释,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国欧盟,例如德国总理默克尔到司法部长都直接表明了态度,要奥巴马作出说明。

习奥会开得很好,使中美紧张关系出现转机,双方要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上共同努力,这个来之不易的良好开局值得珍惜。但是,中国不应因此而投鼠忌器。虽然中美在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建有网络工作组,双方可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沟通。

为了摆脱在国内外四面楚歌的困境,经过几天的惊慌失措之后,缓过神来的美国政客们,伙同前些天还在声讨奥巴马政府侵犯人身自由、新闻自由和网络自由的媒体,开始战略战术大转移,再次使出了贼喊捉贼,栽赃陷害的伎俩:无凭无据地公开叫嚷斯诺登是中国间谍,妄图把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间谍门事件,转嫁为中国收买斯诺登的间谍事件。

令人意外的是已经沉寂几年的前副总统切尼,这个老牌的仇华反华政客,也按捺不住寂寞,使出了惯有的无中生有的想像力,仅凭斯诺登之所以选择逃到香港,就捏造怀疑斯诺登是中国间谍。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也宣称,如果证实斯诺登是被中方诱降,美国情报机关一定要查到底。

妄想把中国整成下一个伊拉克

更为荒唐的是,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登振振有词地说,“如果我仍然在政府任职,那么我会命令下属首先假设这并非一个随机事件;我们必须假设斯诺登已经有或将有与中国政府方面的联系”,而对此进行调查。这也是美国政客的惯技。

想当初正是切尼打头阵的小布什政府为了灭掉反美的伊拉克萨达姆政府,首先就假设了萨达姆政府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同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尽管事实是与假设和调查相反的,且已为历史证明。但循此假设进行调查的最终结果,把其假设变成“事实”,于是美国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单方面发动了侵略伊拉克的战争,灭掉了萨达姆政府,处决了萨达姆总统。

造成伊拉克民族浩劫、国家灾难,至今数十万死伤,美国也付出数千官兵伤亡的代价。伊拉克当前仍然深陷于混乱暴乱之中。切尼在美国政府的庇护下,身负侵略战争罪、反人类罪却逍遥法外,仍不思悔改,似有要把中国整成下一个伊拉克则死而不瞑目之势。

斗争是达致更好合作的重要手段

对切尼政客们为转移国内外视线而

纽约的小摊小贩

罗慰年/文

民以食为天,上次我写了篇纽约城的小餐车,国内的编辑给我说,最近中国小餐车的相关微博很热,却是洛阳大叔美国名校前摆摊的传奇。

话说河南大叔谢云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门口摆摊;只能听懂 one、two、three,连 four 都听不懂;生意好时每天有七八百美元收入。

这种平民的致富路径听上去带有美国梦的调调。

纽约全市目前约有 530 辆食品车,其中 405 辆全年运营,125 辆仅在夏季运营。从数量上看,餐车的数量范围并没有发展到苍蝇馆子,三步一岗哨的地步。不过,纽约卫生局收紧检查程序、对食品操作的要求更严格和明确食品车尺寸。

小摊小贩在哪里都是民生问题。纽约城也有“联合执法”,可出面的不是城管,而是政客。顾雅明与葛罗尼克联袂出动,视察法拉盛时发现,很多食品车不仅停在违规处运营,还给周围环境带来大影响。

围绕纽约街头烧烤,纽约城的政治家们分外的忙碌。美国的行情,大到总统选举,小到大批饮料到底废除不废除,这都不是小事,而是牵动人心的大事。这里面有精彩,也有博弈。谁说了都不算。

代表餐车的议员们说,纽约街头的流动食品车、蔬果摊、花鸟画摊是很多新移民养家糊口的工具,然而卫生局、市警局、消费者事务局等频频开罚单,让辛苦工作的摊主叫苦不迭。

纽约市议员瓦隆,代表的是餐馆这一有产阶级的利益。串烧食品车是餐馆业的竞争对手。餐馆们很是不满,指责食品车制造街道垃圾、噪音、抢夺生意、食品不卫生、不付罚单等。瓦隆说,餐馆与流动食品车相比,支付更高的税收和租金,还要面临更多卫生局、清洁局等政府部门的检查。如果政府不能保护餐馆,那流动食品车会对餐馆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他也赞成限制食品车的摆放地点。

纽约市华人市议员顾雅明说,串烧食品车在法拉盛很受欢迎,但周围商家和居民都投诉烧烤串製造的烟味、燃料排放和产生的垃圾。他认为,市府应该保护居民和小商家,如果可以,应该专门设立一个美食区或夜市,让所有美食食品车都集中在一处,民众可以尽情享受而不吵到周围商家或居民。顾雅明的主张,不是把小摊小贩灭了,而是给他们找一条出路,让他们集中在一起做生意。有些像美食城。

谋生不易,哪里都有江湖,到了那个国家都得挨管,这年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纽约“城管”怎么执法,小餐车哪些情况可能触犯法规会被罚款,这是问题的实质。纽约市政府正在步步为营,加强对食品车的执法。

市议员葛罗尼克提出 1025 号提案,要求由交通局与卫生局合作指定食品车摆放地点;卫生局要在地图上清楚标明食品车可以摆放的所有地点等。

目前,法令限制食品车停在下地点:停车咪表处、有任何[no standing]、[no parking]标示牌的地方、任何离街角 25 呎、离超市 500 呎和离学校 200 呎

的地方。违者要吃罚单“炸弹”。一个炸弹是 1000 美元金,围绕着是否减少罚单“炸弹”,几方利益人士也开始了对峙。

市议员列文交出了减低罚款的提案,将最高罚款额从每次 1000 元降至 500 元的 434-A 号提案。列文表示,很多摊贩仅因为摊位离规定位置多了几吋就要吃罚单,而动辄就上千元的罚单,让很多摊贩根本无法承受,必须降低罚款额。

但是,纽约市政府也有自己的小算盘,这个算盘是,希望在未来两年之内让食品车都转为使用清洁能源。所以,罚单实际上为纽约带来了推动这一环保计划的滚滚财源。因此,在罚单的问题上,纽约市政府希望开个市议会,能让卫生局、环保局、交通局有权针对食品车的噪音、空气和灯光污染开罚单。

不少食品车摊贩都认为,卫生局等检查人员已经非常严格,经常开罚单,让他们生意很难做。他们选择街角或人流处摆摊也是因为这里有生意嘛。他们反对市府再以噪音、空气和灯光等污染为由开罚单。

出席作证的市长营运办公室主任 Elizabeth、卫生局的 Kass 和交通局的 Kate 作证时反对该提案,他们表示,因为一条 1940 年的法庭命令,市府没有权力介入流动食品车和拥有实体店面的餐馆之间的竞争。纽约的先前的立法者,看来早就预见到今天这个争执,预先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要解决小贩问题,绕不开这颗炸弹。

纽约小摊小贩难题,看来一时还得不到解答。